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20世纪美国文学与 圣经传统

杨彩霞 / 著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Biblical Tra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

杨彩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杨彩霞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ISBN 978-7-300-08402-2

I. 20...

II. 杨...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377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

杨彩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0mm×202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8.5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2 00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论文的选题作一说明。之所以选择“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的同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基于以下几个缘由：

首先是现实状况。东西方文明的进程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格调，进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和信仰方式。进入新的千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向。中国学人可以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拓展中汲取更多对中国文化有所补益的营养成分，并能够在异文化背景之下加深对本族文化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从国际局势还是国内情况来看，20世纪对美国人而言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加上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局部战争，给美国人物质和精神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也是难以估量的创伤，他们对未来感到茫然，内心蕴涵着难以言传的恐惧和危机。从文学发展的动态来看，严格意义上，美国文学在20世纪才算真正开始登上世界文坛，美国作家得以在国际范围内受到广泛的认可。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就是对美国文学认可的最好明证。在此以前，一谈到美国小说，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往往是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莫比·迪克》（*Moby Dick*，即《白鲸》，1851）、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红字》（*The Scarlet Let-*

ter, 1850) 以及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1910) 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这些文学经典对后来美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无可否认, 不过也许可以说, 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的大气候。二战后, 欧洲对美国文学的关注无疑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力量重心的转移, 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作家文学才能的积累已经真正到了厚积薄发的地步。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心声, 进入 20 世纪以来, 文学艺术家们对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生活和心理现实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挖掘和透视, 并通过文学作品或细腻或粗略地勾列出来。因此, 选取美国文学史上这一典型时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或许可以挖掘出更具代表性的内容, 从而发现美国文学创作的某些潜在特质。

其次是学科要求。研究西方文论, 必须结合其产生与发展的特殊文化历史状况,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的社会大背景, 即要从文化视角入手, 探讨社会、历史、经济、哲学、宗教等诸多因素对文学艺术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文学作品是一定时代个体作家精神活动的产物, 文学艺术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之中, 他们的思维与创作自然会有形无形、直接间接地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塑造或制约。很难设想会存在脱离文化因素的文学作品, 更难设想会有脱离社会生活的艺术家。因此, 如果忽略对作品植根背景的相关研究, 那么这种研究只能是就文本研究文本, 不可能对作品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地把握和体悟。众所周知, 基督教是对西方社会曾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主导文化因素。基于历史的原因, 这种影响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这种宗教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即便是在当今西方社会基督教面临逐渐式微的情形之下, 这种宗教思想可能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容小视。西方文学中, 基督教思想与圣经文学传统是创作中经常浮现的一个独特现象。有学者认为, 影响西方文学发展的三大外因是希腊神话、基督教教义和近代科学, 这一结论不无道理。研究西方文学, 如若对基督教文化与圣经文学传统没有深入的了解, 则很难能对文学作品产生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把握。反过来说, 如果从文学与宗教交互作用的角度展开文学批评, 则不失为一种独到的研究视角, 会为文学研究洞开一片新颖的天地。

再次是学术意义。对上百年的美国文学成就进行回顾与总结，也会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宗教作为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渗入到世界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诸多领域，文学艺术自然也难以避开其影响。研究美国文学，利用圣经传统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剖析，探寻作家的创作思路，把握文学作品所根植的背景透视，可能会对我们今后的创作和研究更具启发性。而且，从学科领域的发展来看，19世纪，西方诞生了研究世界各种宗教现象的宗教学，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宗教学也纳入了人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样就为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从宗教视点出发进行文论研究是具有理论基点和现实可行性的，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对20世纪美国文学和圣经传统进行对比性研究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从目前文论的现状来看也是切实可行的。

本书标题中的“20世纪美国文学”，是指上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流趋势。为了使研究能够深入展开，本书主要选用美国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例证加以说明。之所以把讨论限定在一定的作家以及他们相对有限的作品，是为了能够比较详尽、深入地对其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和小说的筛选完全是根据其对本文讨论问题的宗旨以及涉及的相关主题的作用和意义做出的。其他重要作家，因其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或者因为篇幅有限，只好把他们置于本文的视野之外。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出于选题的考虑，而绝非其他原因，因为从20世纪美国文学的庞大作家阵容来看，任何选择恐怕都难免挂一漏万。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重点选择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两位作家进行研究。福克纳和斯坦贝克位居20世纪美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同属带有普遍性的区域性作家，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美国文学的某些普遍特征，从中可以窥视美国文学想象的一些共性内容。文论家韦恩·乌德认为：“也许从20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影响中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美国小说家是海明威、福克纳和斯坦贝克，三

人最为优秀的作品都离开都市环境，三人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利用美国浪漫故事—小说的传统。威廉·福克纳是其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在其最出色的五部作品里最充分地运用了浪漫故事—小说的技巧，包括风格在内。这五部小说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以及《去吧，摩西》。”^① 梁工主编的《基督教文学》一书论述到基督教与20世纪美国文学的关系时，选取了四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戏剧家是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斯，小说家就是约翰·斯坦贝克和威廉·福克纳，两位小说家的文学创作与基督教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希望通过作家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以及整个国民心态来找寻作家们的心理体验与文学想象的借喻，以此探讨基督教传统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他们是如何在作品中保持文学创作与文化传统的张力，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从美国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长篇小说取得特殊成就的时代，30年代是它最为繁荣的时期。因此，研究美国小说创作，这一时期往往成为批评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对这一时期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期间，美国正在发展一个重要的现代文学。也许这是本世纪最具主导地位的文学现象，它指明了许多主要方向，并提出了许多基本的美学问题。此时出现的两三代作家里面有许多非同寻常的天才，这是美国艺术最多产的时期之一。马尔科姆·考利（Malcom Cowley）把20年代称为‘第二次成熟’（the second flowering），这是把它与内战之前麦尔维尔、霍桑、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时期的‘美国文艺复兴’相比而言的。”^② 本文选择的两位作家的重要作品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两人又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膺者，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福克纳是一位艺术风格非常独特的作家，

① eds. David Mogen, Mark Busby & Paul Bryant, *The frontier experien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essay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p. 56. (以下除非特别说明，英语原著引文均为笔者所译，译名主要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② ed. Marcus Cunliff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p. 4.

他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尝试,运用多种创作技巧和方法来构思小说的结构和情节,比如说,他对“时间”观念的处理是对乔伊斯以来“意识流”创作技巧的一个巨大发展。在西方文学潮流中,其题材和构思堪称奇妙独特,艺术风格标新立异,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坦贝克是与福克纳创作风格迥然相异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创作中表现的“非目的论”思维方式以及对宗教内容的反讽叙述,也为20世纪美国文学树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书的写作视角主要是分析圣经文学传统与美国文学之间的关联,选择这两位作家也大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他们的作品显著带有与圣经思想相关的内容和结构,表明他们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力图运用古老的文学传统重新架构现代美国社会生活,其文学叙述与《圣经》的记载遥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位都不属于基督教作家,因为他们并不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宣扬基督教精神或者解读《圣经》文本。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反其意而用之,运用反讽的文学形式,结合圣经内容对现实生活进行辛辣的嘲弄与无情的讽喻。在一定意义上,非基督教作家也许更能代表美国文学之中的普遍现象。因此,对这类作家进行文本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出圣经传统与美国文学的某种潜在关联。但是,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文章的篇幅,本书并不打算涵盖圣经文学传统对美国作家影响的每个方面,也不企图表现整个美国文学受到的基督教影响和涌现的文学观念,更不奢望针对基督教作家论述这一问题。

综上,笔者认为选择这两位作家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比较切合本文论述的主题。由于笔章所限,本文在选材上,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重避轻。对于福克纳和斯坦贝克这样的作家,分析时同样也难免挂一漏万,因为对任何一位的研究都可以著书立作。本书最为关注的是他们作品中对圣经传统的借鉴、运用和吸纳,换言之,圣经传统对作家人生体验、想象力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因此,本文重点选择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和《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1936)、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8)和《伊甸之东》(*East of Eden*, 1951)进行文本分析,希冀以此为主线来探索圣经传统对美国文学想象力显在或潜在的影响。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文中谈到的“圣经传统”是指蕴涵在《圣

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里的主要思想以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它关涉到社会、历史、律法、哲学等诸多领域,渗透到西方政治、伦理、道德、哲理的各个层面,是凝聚在民族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圣经文学传统”主要是指两约中丰富的文学性、叙事结构及表现手法。本书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阐释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同构关系,这是因为无论是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和迭起,还是神学理念与流派的不断更替,无不是与美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与人文学思考对这些实际问题的应答相互同构的。

目前,对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重视,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地拓展。但从文学与宗教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力度尚显不足。以中国文论作为研究的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跳出“此山”,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以一种异质文化的眼光来观照西方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内在关系,从而力图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和新的评估。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认为,只有超越了东西方各自视野的局限性,站在更加开放的立场上去把握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特质,人类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那么,文学才在真正意义上充当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媒介。

从本书选题的角度来看,难度系数颇大。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美国文学包罗万象,社会又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又不能脱离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结合之进行综合的研究,这就需要进行仔细的筛选和理性审视的思考。同时,圣经传统也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神学学派和文学流派可能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诠释。本书主要限定在以上规定的框架之内,以《圣经》文本的主要观念和基本思想为出发点,具体探讨蕴涵在文学创作中的圣经思想和传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同构关系,即从文本入手进行文化探讨和剖析。在论文选题和材料筛选过程中,笔者曾经思考过以下几个问题:(1)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的同构关系;(2)美国基督教神学与美国社会思潮的同构关系;(3)20世纪美国文论与神学关注的同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方面是研究美国文学与基督教思想所必须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由于精力和水平有限,笔者把本书的研究目标定位于力图解决第一个问题。

目 录

导论：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渊源关系	1
第一章 20 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	17
第一节 20 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背景透视	17
(一) 影响美国文学创作的社会因素	22
(二) 神学关注在美国文学创作中的渗透	29
(三) 文学批评的圣经传统视角	37
第二节 圣经传统与 20 世纪美国文学关系概论	42
第二章 威廉·福克纳创作中体现的基督教视角与 圣经文学传统	51
第一节 威廉·福克纳与南方清教主义传统	51
第二节 威廉·福克纳创作中的基督教视角： 文本中的圣经文学传统	67
(一)《喧哗与骚动》的基督教视角	67
(二)《押沙龙，押沙龙！》的基督教视角	87
第三节 威廉·福克纳其他作品中对圣经传统的运用	105
第三章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圣经思想与文学传统概述	117
第一节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圣经母题的再现	118
第二节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对圣经叙事结构的 援引和变异	131
第三节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圣经意象和象征的表现	137

第四节 威廉·福克纳的基督原型人物和反讽结构	144
第四章 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中体现的基督教视角与	
圣经文学传统	149
第一节 约翰·斯坦贝克与基督教文化传统	149
(一) 塑造约翰·斯坦贝克文学创作风格的	
主要因素	149
(二) 基督教思想对约翰·斯坦贝克文学	
创作的影响	159
第二节 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中的基督教视角:	
文本中的圣经文学传统	162
(一)《愤怒的葡萄》的基督教视角	162
(二)《伊甸之东》的基督教视角	202
第三节 约翰·斯坦贝克其他作品中体现的基督教视角	
——以《致一位未知的神》为例	210
第五章 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圣经思想与	
文学传统概述	215
第一节 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中的圣经母题	215
第二节 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中借用的圣经结构	220
第三节 约翰·斯坦贝克的基督式人物形象和意象表现	222
第四节 约翰·斯坦贝克创作中运用的反讽手法	226
第六章 威廉·福克纳与约翰·斯坦贝克文学创作的比较:	
一个基督教视角	231
结语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的同构关系	237
参考文献	247
附录一 威廉·福克纳年表	253
附录二 约翰·斯坦贝克年表	259

导 论：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渊源关系

在西方人眼里，艺术和宗教寻求的都是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它们关注的是终极现实与人的命运问题。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文学，从宏观的角度透视微观的现象和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影响文学的社会、政治、历史、宗教等各种外在因素。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精神力量，始终存活于各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潜在精神力量外在地显现在人们的思维心智、言谈举止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并且在不断地更新生长，与时俱进。

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涤荡，在对立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态势。从其历史渊源来看，欧美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在发扬自身文化传统、兼容外来文化势力侵袭的过程中，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基督教思想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文化形态。基督教文化是欧美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形态，是通过希腊和希伯来这“两希”文化传统的融合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文化结构。基督教文化继承了古希伯来文化即犹太教中的信仰传统以及古希腊精神中的理性传统，因此，这种文化中信仰与理性交织共存，形象思维与思辨精神相互补充。基督教文化中蕴涵的这些形象思维的内容、弥漫的浪漫精神为后来的西方文学想象预备了丰富的宗教文学性内容和气氛。

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基督教已经不再

是完全狭隘的正统神学教义，而是逐渐超越出其宗教的维度与框架，渐渐地渗透到西方人的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其形成的两千多年以来，基督教思想可以说在西方各个领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结构的形成、政治经济形态的建构以及文学艺术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曾经或正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基督教文化并不简单是一种区域性文化体系，它同时又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体系，是一种蕴涵极大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宗教文化。我们平常讲到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区分，其实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划分。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的根本本来是源出于东方，是从希伯来—拜占庭一路发展而来的思想形态。在各个民族文化斗争、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后来在亚、非、欧各洲都有萌芽、发展和兴旺的痕迹和趋势。但是到了后来，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高，逐渐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它不但充当着宗教的角色，而且在许多西方人眼里，长期以来它还承担着教化和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伦理功能，因此它又是一种伦理化的宗教，具有很强的绝对性，并不需要理性的论证和认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 T. Toynbee）曾得出“文明类型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①的结论，他强调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精神创造活动的标志。从其历史渊源来看，西方文化的存在以基督教思想作为基本参照系，而后者亦对世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做出相应的回应，从而奠定了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思想根基。

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思想来源是《圣经》，这一本来以宗教内容为主旨的经典却极富文学性。自公元1世纪末希伯来《圣经》产生以来，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们或借用或援引其思想与结构，通过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创作体裁逐渐形成了一种从中生发出来隐含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圣经文学传统，并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这种文学传统在形成的过程中，从古代进入当代，从东方传到西方，渗透到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层面。就欧美文学而言，

^① A. T. Toynbee: *Choose life: a dialogue*, p. 287.

《圣经》中所包含与体现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的渗透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圣经》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以使论文的展开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圣经》即《新旧约全书》，《旧约》就是指希伯来圣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律法、伦理等思想内容，并具有十分强烈的文学性。希伯来人就是古代的犹太人，起源于阿拉伯沙漠的一个游牧部落——闪族。希伯来民族在历史上可谓多灾多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经受了长期的外族奴役、四处颠簸流亡的凄惨生活。然而，苦难的生活磨炼造就了一个极富聪明才智的民族，使其创造出了辉煌璀璨的人类文明。他们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一神教，信奉唯一的上帝耶和华，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选之民”（the Chosen People），他们拥有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历史上，闪族曾经有3次大规模地向阿拉伯沙漠迁移，进入了中东有名的“肥沃新月形”（the fertile Crescent）地带，这是《圣经》里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迦南美地。在向漠北迁徙过程中，他们的民族思想与迦南地区复杂的文化习俗、宗教思想、语言形式以及文学艺术相互碰撞融合，吸纳了这个人类古老文明摇篮的优秀文化因子，形成了独特的希伯来文化。当时他们还创造了民族文字——希伯来文，从而能够把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史诗、民谣等原始的民间文学形态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在记录自己民族发展史以及宗教一神教的过程中，他们创造的“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奇葩。

从文化内容来看，希伯来文化最辉煌的时代应该是大卫及其儿子所罗门统治的时期（公元前1013—公元前933年）。当时，国家强盛，财力兴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平盛世，文学艺术自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抒情诗、哲理诗等极富文学内涵的艺术作品，它们与以前的“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一起成为希伯来文学遗产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可以说共同构成了希伯来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然而，辉煌之极必将沦落衰败。所罗门死后，王国便开始走下坡路，国力渐衰，后来终于一分为二，成为北国以

色列和南国犹太，并先后被亚述和巴比伦灭亡。公元135年，犹太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希伯来人”的历史到此结束，此后进入了“犹太人”的历史时期。不过，在此期间，希伯来文化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犹太教逐渐成熟起来。波斯、希腊文化对其产生了新的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古典文献的整理等文化活动，促使希伯来文化产生质的新变化，形成了后来对西方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督教文化的雏形，这种影响显然后来波及整个世界。

《新约》虽然是受到《旧约》的影响而撰写出来的基督教经典，但从宗教意义上讲，因其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关涉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神学教义，《新约》在许多人眼中被视为神学正典，在神学思想方面占据统治地位。《新约》各卷汲取了《旧约》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其中很多地方是对《旧约》内容的直接引证、化用、参照、注解和旁白，或隐或现地与《旧约》内容和观念遥相呼应。弗莱(Northrop Frye)发现，《旧约》是《新约》的原型，《新约》是《旧约》的回声，“‘新约隐匿于《旧约》之中。《旧约》借助《新约》得以显现。’……《旧约》中的一切成为《新约》事件的先前模型或预兆。……《新约》中的事件构成了《旧约》中先前模型所预示的现实‘原型’(antitype)。”^①弗莱的这一评断深刻揭示了两约之间在思想内容上的内在关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旧约》里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性，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其中故事的叙述、结构的安排以及情节的铺垫，都带有文学所独有的特质，对历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大多来自希伯来《旧约》。而《新约》总体上不像《旧约》那样具有强烈的文学特征，但是其文学体裁以及思想内容在文学创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新约》也洞开了思想的另一片天地，历代艺术家亦从中得到不同的启示，他们不断从中汲取创作的思想源泉，尤其是借用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从而使独特的圣经文学传统得以承袭下来。从神学领域来看，《新旧约全书》被确立为基督教经典之后，早期教父创作了许多包含圣经意象和象征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书的影响和激发而写成的，

①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112、113页。

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代表作《忏悔录》和《神圣之城》里就充满了大量的圣经思想和意念。这种思想方式和写作手法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的三百年属于希腊化时代，希腊语成了中东以及地中海沿岸的通用语言，《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语言这一载体使宗教思想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从这一历史渊源来看，基督教文化是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和西方的希腊文化相互撞击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基督教拥有两个文化源头，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希文化”，它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共同作用的一个文化产物。如果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两种文化形态显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开始时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只是到了晚期，才开始频繁接触起来，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气可以说已经蔚然成风，通用的希腊语更加促使了基督教思想的广泛传播。

基督教在其形成的初期，曾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到了公元334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教信仰才最终成为官方许可的宗教活动，基督教文化才算在真正意义上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文化得到了丰富的滋养和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渗透到欧美人的社会习俗与文化生活当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基督教神话中体现了对人类价值、命运前途与终极归宿的深刻思考。从这一渊源来讲，欧洲文化历史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基督教思想这条红线，也许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文化其实就是日耳曼文化与“两希文化”相结合的基督教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从它步入西方思想领域之始，基督教便逐渐表现出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与渗透，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欧洲都化成了基督教的世界。也许不妨这样说，在根本意义上，西方文化实质上就是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希腊、罗马文化思想的古典成分，与日耳曼文化相融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从宏观上可以说西方文化便是基督教文化。

从宗教视角来看，欧洲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更为客观地说，

它至少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基本参照系的。从它与文学的关系来看，西方文字，即便是其题材和主题与基督教看似并无直接的关联，也很难避开与基督教文化发生某种密切的关系，因为基督教思想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肌体的每一个细胞。从历史上来看，《圣经》作为基督教思想的经典，同时也为中世纪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基本素材。我们知道，中世纪欧洲文学的主体是教会文学，教会文学围绕的中心自然是《圣经》文本。虽然当时存在着繁多的创作体裁，但它们跟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却有着很大的距离。教会文学的内容主要是圣经故事的再现，体裁有赞美诗、祈祷文、奇迹故事、宗教剧等，情节大多是围绕《圣经》及其基本观念做文章，比如宣扬上帝的至高无上和宽恕仁慈，赞美耶稣基督的伟大神迹和牺牲精神，歌颂圣徒们的虔诚以及他们为信仰而献身的作为。这类作品其实是对《圣经》思想或结构的引用和化解，有些可能就是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直接图解，着重从不同方面对其中的观念和意蕴加以引证或阐发。在表现技巧上，大多采用梦境、奇迹、虚幻等处理手法，在情节叙述中烘托出朦胧神秘的气氛。因此，这类作品具有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表现手法，其主旨大多意在进行说教或规劝，宣扬上帝对人类的恩典以及救赎精神。这些内容显然也是从圣经文学传统中沿袭继承而来的。

这种文学现象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最重要代表但丁创作的《神曲》中即可一见端倪。《神曲》事实上是对《圣经》内容的文学注解，其创作灵感可以说直接得益于《圣经》的思维结构和思想内容。比如，作家着意探讨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问题，这是《圣经》中的启示话题之一，也是历代人们关注的人类命运和终极价值观的母题，跟我们现代人探讨的终极关怀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所描绘的景象与《圣经》中提到的基本一样，只不过是叙事手法更具文学性而已。与亚当、夏娃生活的伊甸园相对应，作者描写了生长着智慧树的地土乐园；自然也涉及了亚当、夏娃、亚伯拉罕、耶稣等重要的圣经人物。作者还不时提及亚伯拉罕与上帝之约以及摩西等《旧约》中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和事件，有《圣经》知识的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与圣经内容相关联的丰富联想。

《圣经》对欧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在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